

张英 著

唐宋贬谪词研究



暮雨霏微，乱峰相倚。
楚宫朱草。画戟移春，
一川都会。万里投荒，
何欢意。

天尺五，望极神州，
酒公堂，有中朝佳士。
脐香满，解舞榭歌楼，
文到晓，不如归是。

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是，三国周郎赤壁。

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时多少豪杰。

小乔初嫁了，

遥想小乔初嫁了，

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尊还酹江月。

见梅作

信，梅破知春近。

迟，不道晓来开遍向南枝。

妒，飘到阑心住。

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

冥，杜鹃声里斜阳暮。

冥，杜鹃声里斜阳暮。

冥，杜鹃声里斜阳暮。

张英著

唐宋贬谪词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宋贬谪词研究/张英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5203-1124-3

I. ①唐… II. ①张… III. ①词学—诗歌史—中国—唐宋时期
IV. ①I207.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849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5
插 页 2
字 数 329 千字
定 价 10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张英是我指导的博士，她当时在博士论文选题时很是费了一番周折，后来受武汉大学尚永亮教授《贬谪文学与贬谪文化》一书的启示，萌生了以“唐宋贬谪词”为研究对象的想法，在征求我意见时我感到这个题目颇有新意，遂欣然同意。经过了三年的努力，张英完成了30万字左右的博士论文，如今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的《唐宋贬谪词研究》即将付梓出版，我很为她高兴，也乐意为她的书写几句话以示鼓励。

在中国古代社会，贬谪是文人们常遭遇的惩处。这种经历对于他们的人生而言当然是一种挫折甚至灾难，但与此同时，凝结着血泪的贬谪经历又往往催生了文学上的璀璨花朵，成就了许多文学史上的大家和至今传诵不歇的名篇，这其中，也包括词体文学的创作。在学术界，贬谪文学研究已经有相当多的成果，但这些研究大多偏重于贬谪诗文，对贬谪词的关注尚不够。《唐宋贬谪词研究》能以时间为序较全面地勾勒出从中唐到南宋的贬谪词发展进程和风貌，是一大创新之处。而在我看来更为有价值的部分，是作者在勾勒唐宋贬谪词史的基础上，以贬谪为视角，对文人词的诞生、繁荣以及词体的“诗化”给予了一种新的解读。对于文人词的诞生和繁荣，作者认为，中唐词史上几位重要人物都经历

过贬谪，贬谪使他们得以接触到民间曲调并开始了填词的创作；贬谪使他们的心态发生了由进取到闲隐的变化，促进了文人词的兴起和繁盛，因此，“中唐文人词的出场，非但伴有美女、美酒和音乐，更与凄风苦雨、蛮荒猿啼的文人贬谪密切相关”。对于词体的“诗化”，作者则认为，是贬谪中的畏祸心理使文人将诗文中的题材转移到词中，形成了词在题材上的拓宽；词人贬谪中的经历使词境由狭小变阔大，由柔媚变刚健；贬谪使词人更加注重自我情感的抒发，改变了“男子而作闺音”的传统写作方式；贬谪也使词体中香草美人的寄托表现得更加明朗可解，使词作意蕴更加丰厚；贬谪词人以词酬唱，表现出情感上的共鸣和志向上的共勉，提高了词的功能。这些观点尽管在论证中尚有不够严密之处，但的确提供了新的想法，是非常有意义的。此外，本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其行文之中饱注情感且颇具文采，具有较好的可读性。特别在解读具体词作的时候，作者往往能结合词中所写之意境，以现代美文式的语言加以阐释，如对黄庭坚《念奴娇·断虹霁雨》和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的解读，语言便非常优美，此类例子很多，读者可以自行详观，此处不再赘述。

当然本书还存在着一些欠缺之处：如对唐宋词人贬谪情况可进一步用定量分析的方式去统计和分析，会更加具有说服力；在理论深度方面也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语言也失于繁冗不够简练。可喜的是，目前张英在《唐宋贬谪词研究》的基础上已经成功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贬谪文人与贬谪文学研究”，在这一课题中她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包括诗、词、文在内的整个宋代贬谪文学，本书也成为这一课题的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希望她能够在今后的研究中取得更大成绩！

杨海明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中唐文人词的兴起与文人贬谪	16
第一节 中唐文人贬谪与中唐贬谪词的创作	17
第二节 中唐文人贬谪与文人词对民歌的学习借鉴	28
第三节 中唐文人贬谪后的心态对唐宋词的影响	34
第二章 北宋党争背景下的贬谪词	62
第一节 北宋党争背景下的词人贬谪情况	63
第二节 北宋贬谪词的风貌	92

第三章 南宋和战斗争背景下的贬谪词	158
第一节 南宋和战斗争背景下的词人贬谪情况	159
第二节 南宋贬谪词的风貌	186
第四章 宋玉、屈原、陶渊明与唐宋贬谪词	238
第一节 文人的感伤——宋玉对唐宋贬谪词的影响	239
第二节 志士的执着——屈原对唐宋贬谪词的影响	256
第三节 达者的睿智——陶渊明对唐宋贬谪词的影响	275
第五章 词人贬谪与唐宋词的“诗化”	315
第一节 畏祸心理的驱使——词人贬谪与词体题材的拓宽	318
第二节 万水千山行遍——词人贬谪与词境的转变	331
第三节 不作妮子态——词人贬谪与词作抒情主人公的转变	343
第四节 文外有事——词人贬谪与词作中的寄托之意	353
第五节 词亦可以群——贬谪词人之酬唱与词体功能的提高	368
结 语	381
主要参考文献	383
后 记	393

绪 论

《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的作者尚永亮先生说：“一部中国文学史，很大程度上是由迁客骚人的低吟高唱所构成。”^①在这曲“低吟高唱”的交响乐中，唐宋贬谪词是一段不可忽视的重要旋律。它不仅与唐宋贬谪诗文一同构成了贬谪文学的高潮，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唐宋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而且成功地构筑了词体自身的兴起、发展和蜕变。可以说，没有唐宋贬谪词，词史的发展脉络就无从谈起。甚至可以说，没有唐宋贬谪词，整个宏大壮阔的文学史就会失色很多。

给唐宋贬谪词以如此高的定位，首先，唐宋两代贬谪词人众多，每个重要阶段的代表词人几乎都经历过贬谪。试看，唐宋文人词的开端者白居易、刘禹锡；花间词鼻祖温庭筠；北宋小令词成就的代表者晏殊、欧阳修；豪放词的两大代表人物苏轼与辛弃疾；婉约词的两大代表人物秦观与周邦彦，他们哪一个没有过沉痛的贬谪经历？其次，在唐宋词史上，许多家喻户晓的名篇都是这些词人在贬谪中所作。我们随手拈出几个——“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

^① 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首令“关西大汉”持“铜琵琶、铁绰板”而唱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正是苏轼作于因“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期间；“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秦观这首被王国维称为“由凄婉而变凄厉”的《踏莎行》，正是作于他贬谪郴州之时；“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簋，汉箭朝飞金仆姑。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都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这首《鹧鸪天》则是辛弃疾在贬居瓢泉时为平生抗金志向未酬而发出的慨叹……唐宋词若没有了这些词人在贬谪中所作的名篇，其辉煌的成就无疑将大打折扣，有愧王国维“一代之文学”的美誉。

以上仅仅是表面现象。贬谪在唐宋词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作用，一是促成其兴起，二是促成其诗化。就兴起而言，白居易、刘禹锡等中唐文人词的开创者，都是在贬谪之后吸收了民歌的营养，开始了词的创作。亦是在贬谪之后，完成了心态上由于事功向中隐休闲生活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文人词所需要的那种休闲享乐的文化氛围，为文人词的兴起、繁盛创造了条件。就唐宋词的诗化而言，贬谪所起到的作用更为显著。概括而言，文人们在贬谪中的畏罪与避祸的心理，促使他们将诗文中的题材转移到了词中，推动了词在题材上的拓宽；贬谪文人们行遍万水千山的旅程，开阔了他们的眼界，让他们笔下的词作在词境上由狭小变阔大，由柔媚变刚健；贬谪的客观环境使词人们失去了为歌女作词的条件和氛围，贬谪中内心的苦闷抑郁也使词人们的兴趣由歌舞女转向自身，从而改变了“男子而作闺音”的创作方式，抒情主人公由女性转为男性；由于贬谪词人们的“弃妇心理”和“畏罪意识”，词体当中更多地出现了“文外有事”的寄托，从而使词作的情感更加厚重，在很大程度上向“言志”的诗歌靠近；贬谪词人们由于在情感上的共鸣与

志向上的共勉，他们用词互相酬唱，使词像诗歌一样“可以群”，开拓了词体的功能。可以说，无论在题材上、风格上，还是在功能上，贬谪都是促使唐宋词向诗歌靠近的重要原因。既然唐宋词的“兴起”与“诗化”两大命题都与贬谪密切相关，贬谪之于唐宋词的作用，可谓大矣！

在正式开始唐宋贬谪词研究之前，我们将对贬谪及贬谪文学的界定、贬谪文学研究的意义以及贬谪文学研究的现状与不足做一番简略的审视与分析。

一 贬谪文学以及贬谪词的界定

尽管贬谪文学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学界对“贬谪文学”的概念却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由于这涉及贬谪文学研究对象的范围，没有明确的界定极易使研究者因为概念的不一致而形成观点上的不同，甚至出现自相矛盾的状况。因此，本书将首先对“贬谪文学”加以界定，希望此种界定不仅用之于本书，亦希望能因其合理性而通行于贬谪文学研究领域。

我们将通过对以下三个问题的回答来完成此界定，即：

1. 关于作者：贬谪文学的作者应该是什么样的人？
2. 关于时间：贬谪文学的创作应该有什么样的时间段限制？
3. 关于作品：贬谪文学的作品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关于作者，笔者认为应当是亲身经历贬谪者。这其中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这里所说的身经贬谪者，既包括那些“无罪而贬者”，亦包括那些“罪有应得者”。第二，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有些人虽未经历贬谪，但在作品中表现出贬谪之感，这样的作品也应属贬谪文学。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可作为“广义”的贬谪文学概念，但因其在实际研究中缺乏可操作性和辨别性，本书不予采纳。

关于时间，笔者认为贬谪文学的创作时间一般是在贬谪期间，包括：接到谪命即将赶赴贬所之时、赶赴贬所的途中、在贬谪地生活期间。此外，贬谪者在受到赦免重返朝堂或者致仕归乡之后，回忆贬谪期间的生活和感受的作品，亦应归入贬谪文学的范围之内。贬谪之前的作品，应排除在外。

关于作品，笔者认为，对贬谪文学作品的特征不宜作过细规定，否则在研究中容易作茧自缚。如有些学者强调贬谪文学所具有的“激愤不平之气”等特征，过于狭隘。笔者认为凡是与贬谪生活和情感相关的作品，便可归入贬谪文学。

总而言之，贬谪文学是贬谪者在贬谪期间（及贬谪之后）所写的与贬谪生活和情感相关的作品。由此我们亦可以得出贬谪词的概念：在本书中，“贬谪词”指贬谪者在贬谪期间（及贬谪之后）所创作的与贬谪生活和情感相关的词作。

二 贬谪文学研究的意义

由于贬谪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一种普遍遭遇，而这种遭遇对文学上的影响巨大，因此贬谪文学研究具有独特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贬谪是中国古代士人的普遍遭遇

惩罚，本是针对那些不法之徒的，但是在古代中国，除了那些罪有应得者之外，贬谪这种惩罚更是常常落在那些忠正耿直的士大夫头上。尚永亮先生将他们被贬的原因分为四类：“志大才高，因小人的谗毁而被贬，屈原、贾谊可为代表；革新弊政，因斗争失败而被贬，柳宗元、刘禹锡可为代表；直言进谏，因触怒龙颜而被贬，阳城、韩愈等即是；

党争激烈，因本派失利而被贬，其代表人物可推李德裕、苏轼。”^① 贬谪这种对士人的惩处方式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如此普遍，主要是由中国古代专制制度的根本特征和中国古代士人的独特品质决定的，更确切地说，是“道统”与“政统”的依附与抗衡产生的必然结果。

从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体制来看，君主享有独裁地位，整个官僚体制都处于他的统治之下，君王的权力至高无上不可触犯。君王的意愿和话语是所谓的“金科玉律”，几乎具备法律的效力。他们手中掌握着对臣下生杀予夺的大权，更不要说“贬谪”这样罚不及死的惩处。当然，君主为了巩固统治，延长世系，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也希望把天下治理得富强安定，为此，他们必须依靠士人为他们出谋划策，打理事务，于是历代君王都会招揽贤才能士，给予他们爵位、官职和俸禄。但是一方面，君王权力的过大，自然会产生不合理的滥用，其出于一己的喜好与倦恶，即便只是一念之间，也有可能对一个士人终生的命运产生无法逆转的影响；另一方面，真正能够从内心深处认识到维护社会正义、维护民众利益与维护皇室长远利益相一致的君王并不多，而能够从情感、性格、道德上自觉地约束、规范自己，能够诚心实意地接受批评并纠正自己错误的君王则更为罕见。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宰相、中书等制度也确实能够对君权产生一定的制约力，但这种制约力非常有限，当宰相、中书等机构当中亦产生意见分歧乃至权力斗争的时候，最为重要的、决定性的力量仍然在君王手中。这一点，我们审视宋代党争中随着君王的更换而导致党争局面的反复这一现象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另外，专制制度同时滋生权力的腐败，一些善于谄媚君王、取巧钻营的小人往往能够打着君主的旗号挟私报复，

^① 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忠良之士打击迫害，尤其是当这些小人爬上高位把持朝政的时候，更容易形成政治上的黑暗。这也是大量贬谪者被“谗毁”的原因。

再看中国古代士人的群体品质和现实出路。儒家先师对于“士”的品质的期许和建构，深刻影响了士大夫刚直不阿、忠正耿直的性格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对社会民生的深厚关怀。这种“志于道”的精神，在士人阶层兴起的先秦时期，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现实中都与“政统”有抗衡的可能性，这是由当时天下分崩的特殊历史境遇所决定的，由于君主并非唯一，士人完全有择主的条件，在“双向选择”的情况下，礼遇士人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但在大一统政权之下天下仅此一家，别无旁主，“道统”便不得不臣服于“政统”。而儒家“学而优则仕”所体现的积极参政的精神，又使士人们在学业已成之后除了做官别无出路，所谓“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特别是唐宋两朝，科举制度给了大批平民知识分子以做官的机会和希望的同时，也给了他们在现实中和精神上的巨大枷锁。因为这种“卖与帝王家”，是无法讨价还价的“卖”。而当年孔子所提倡的“志于道”的理想，孟子的傲骨和浩然正气，在一代代士人之间依然传承着。在“道”与“势”的冲突中，“士人”依然实践着“以身殉道”，这种“殉道”，正是以“贬谪”为主要的表现方式留在历史当中。

（二）贬谪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深刻影响

贬谪对中国古代文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着深刻的影响，由此贬谪文学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从“量”的方面来看，作为中国古代士人普遍性命运之一的贬谪，必然会导致文学史上贬谪文人和贬谪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司马迁曾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

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此语说明人生的种种困厄对于伟大作品的催生作用，但其中，“失明”“膑脚”较为罕见；“迁蜀”“囚秦”则需特殊的历史境况；“拘”而作文者，殆非寻常之人；“厄”而著述者，又太过泛泛。唯有“放逐”即“贬谪”，乃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于仕途中最为常见之困厄，也是对文学的催生作用最强的一大因素。其原因，可归结为以下两点。

其一，文人贬谪后，政治前途上的挫败之感和生活条件上的困苦情形，自然会让他们心怀郁结，诉诸文学是他们发泄心灵愁绪、表现自我情怀的最好方式。元稹在贬谪中便说其将“全盛之气，注射语言”^①。刘禹锡说：“悲斯叹，叹斯愤，愤必有泄，故见乎词。”^②柳宗元说：“时时举首，长吟哀歌，舒泄幽郁。”^③正说明了文人在贬谪中的内心欲求。这在文学理论上也有一条明晰的线索，从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到司马迁所说的“发愤之所为作”，到唐代韩愈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到宋代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都表现出这一点，而其中欧阳修的阐述最为详尽：“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矢志之人，穷苦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事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④

① 元稹：《叙诗寄乐天书》，《元稹集》卷三十，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本，第351页。

② 刘禹锡：《上杜司徒书》，《刘禹锡集》卷十，中华书局1990年校订本，第116页。

③ 柳宗元：《上李中丞献所著文启》，《柳宗元集》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第926页。

④ 欧阳修：《薛简肃公文集序》，《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四十三，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18页。

其二，贬谪使士人从“立德、立功”转向对“立言”的关注。“三立”是儒家所倡导的人生追求的三个层次，立德最上，立功其次，立言最次。^①在贬谪之前，士人虽也关注立言，但更注重的是完善自身道德的“立德”和建立外在功业的“立功”，也正因此，“姚宋不见于文章”。然而在贬谪之后，由于被冠以“贪鄙”“讪谤”等罪名，“立德”已经遭到了质疑，而“立功”的理想，更是因为被剥夺了资格而化为泡影，剩下的唯有立言。儒家是讲究进取的，“三立”正是个人将自身投之于社会进而影响社会的三种表现方式。即便是在贬谪当中，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人亦在内心深处有着这样的追求。“立言”尽管是儒家所倡导的人生追求之最末端，亦表现出间接参与社会之精神。同时，早在魏晋时期人们便已经认识到文学对于延长精神生命的重要作用，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对于贬谪文人来说，他们在文学上的创作，不仅仅是为了一般意义上的流传后世，而是自身的行为、信念在当世受到质疑的情况下，为自身辩白，寻求后世知己的希求。

从“质”的方面来看，《沧浪诗话》指出：“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②足见贬谪对于文学作品质量上的提高作用。我们可从作品的题材广度和情感深度两个方面分析。

首先，贬谪使文学题材发生了由窄变宽的变化。一方面，文人们遭遇贬谪后，往往由政治权力的中心被驱逐至荒僻瘴疠之地，边陲大漠、

^①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三不朽”。见杨伯峻校注《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四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88页。

^②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735页。

湖湘海南，到处留下了贬谪文人的足迹，这会让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眼界发生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遭遇贬谪的文人，其生活方式和社会角色都发生了改变，导致其人生阅历也相应增加。于是吊古伤今、自然山水、民风民俗、民生疾苦等需要人生阅历和空间游历的题材便会相应地出现在贬谪文人的笔下。如唐代张说罢相后“既谪岳州，而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之助云。”（《新唐书·张说传》）张九龄贬谪后“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旧唐书·张九龄传》）柳宗元“既摧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埋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旧唐书·柳宗元传》）而刘禹锡作于湖湘及蜀地的诗词，无论在展现社会生活的广度上还是深度上，均较其此前之作有很大的拓展。唐宋词中贬谪使词体题材发生的变化更为明显，这将在正文第五章中论及。

其次，贬谪使文人们在情感上发生了由假而真，由浅而深的变化。在生命沉沦的苦痛中，贬谪文人们开始深切地思考人的命运、生存价值等问题，将这些情感和思索发而为文时，他们已经全然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注入了全部的真性情、真感慨。《清波杂志》卷四《逐客》条有：“放臣逐客，一旦弃置远外，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什，特为酸楚，极有不能自遣者。”^①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这种真情和深情显得尤其重要，用自身生命谱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必然有着格外令人感动、震撼的效果。虽然那些非贬谪文学同样也能够让人感受到作者的情感，但相比之下显然不及贬谪文人笔下的那些表现人生苦难和在这种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作品那样厚重深刻。在某些贬谪者如白

^① 周辉：《清波杂志》卷四，《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050页。

居易、苏轼等人的笔下，常常有着平静淡泊、从容不迫的情调，似乎看不到那份挣扎和抗争，但正如尚永亮先生所说：“作为自我拯救的努力，超越本身就是一种不甘屈服的抗争形式。”^①并且，最终的平静和从容，正表现了他们经历了苦难的挣扎后对命运的胜利，而这应该是更加让我们感动、敬佩的精神。

（三）贬谪文学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贬谪对中国古代士人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遭遇，同时又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贬谪文学研究的意义正建立于此。正如蒋长栋先生所说：“选择贬谪文学研究作为研究课题，不仅是找到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个尚未认真开掘的巨矿，而且是找到了一个含金量甚高的富矿。”^②具体来说，以贬谪作为视角来考察个体作家，是孟子所说的“知人论世”的深化，将会使我们对这类作家作品的面貌有着更加全面的把握；以贬谪作为视角来考察文学史，会对文学史上的一些现象和规律产生更加明晰的认识。此外，贬谪这一现象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内部党争、民族战争以及文化、学术、思想潮流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以贬谪为视角，将牵动与之相关的许多研究领域，从而使文学研究走出狭隘的以文论文的小巷，进入一个更加宽广的视域当中。

贬谪文学研究除了学术上的价值之外，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贬谪是中国古代专制社会中特有的现象，它是与专制独裁的统治相伴而生的，哪里有独裁，哪里就会有类似贬谪的命运。而随着专制体制的逐步瓦解，贬谪这种现象也就渐渐消失。如近现代中国社会

^① 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② 蒋长栋：《一个尚待开拓的文学研究领域》，《贬谪文学论集·序》，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